

追寻汪曾祺的足迹

——序徐强《汪曾祺年谱》

□ 王干

汪先生去世的时候,我从南京赶到北京八宝山向遗体作别。汪先生静躺在鲜花丛中,放的不是常见的哀乐,而是《天鹅之死》。我那天有点失去控制,哭成泪人似的。后来我看录像,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刹那间悲痛从内心涌出不能自己呢?后来想想,我们这些人都有些依恋、依赖老爷子。他是一代人的教父。他走了,自然会如丧考妣。

鲁迅曾经是一代人的教父,这在书、文学史上和报纸上经常会得到确认。而汪曾祺作为新一代人的教父,很少有人提及,也很少有人去这么想。我在《被遮蔽的大师——汪曾祺的价值》一文中曾经写过:“翻开当代的文学史,他的地位有些尴尬,在潮流之外,在专章论述之外,常常处于‘还有’之列。‘还有’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,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,属于边缘,属于后缀性质,总之,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。”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延,随着文学本身大浪淘沙的洗礼,汪曾祺的价值在显现,尤其作为文学教父的身份在慢慢地凸显。

文学教父的价值不在于政治地位,不是因为占据了某个重要岗位就一定能够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。文学教父也不是博导之类的学术位置,并不是收了多少学生或者带了多少徒弟,而是对年轻作家的精神熏陶和滋润。鲁迅当过大学老师,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,鲁迅在大学里无疑影响了很多的青年学生,另一方面柔石、萧红、萧军等并不是在鲁迅任教的学校读书,他们反而比那些在大学接受过鲁迅教诲的学生,更具鲁迅的文学精神。汪曾祺没有当过大学老师,虽然后来也间或收些“学生”,比如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颁奖时,接受赵本夫的跪拜,算是当了师傅,收了弟子。但汪曾祺对青年一代的影响,更多地还是通过他的文字和作品。比如他对阿城《棋王》的评论,影响的不仅仅是阿城这样一代人,对其后的年轻作家影响更为深远。徐强在年谱中提到,1993年在海口、三亚召开的蓝星笔会,在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很少提及到,而当年汪曾祺和之后驰骋文坛的王朔、刘恒、苏童、格非以及评论家陈晓明、王彬彬等人交往,就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因为当初参加会议的全是青年作家和评论家,唯一的老作家就是汪曾祺。作为蓝星笔会策划者之一,我目睹了青年作家们对汪曾祺先生的崇拜敬仰之情,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,老先生被簇拥和爱戴原是因为青年作家对文学教父的无意识的认同。

铁凝在汪曾祺去世十周年的会上说到汪曾祺对她的影响:“汪曾祺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位大师,他的文学成就一直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,他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他的学养、人品和文品,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汪老去世前,我曾有机会多次与汪老交谈,他幽默机智的谈吐、乐观爽朗的人生态度,贯通古今的学养,奖掖后人的热情,时时感染着我,‘与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’,从汪老那里我体验最深。他的音容笑貌,至今可以清晰浮现。今年新春之际,我和几位同事走访在京的一些老作家,那时我常常想起,要是汪老还在世该多好,我又可以走到他的面前,和他聊天,听他富有感染力的教诲。”另一位女作家王安忆,在《汪老讲故事》一文中说到她和汪曾祺的一段交往,“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开会,汪曾祺注意到我的发言稿中有‘聒噪’二字,便问我的‘聒’从何得来。我说并没有什么地方,就这样很平常。他让我再想想,我想了想,说:‘是从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里得来。’他便说:‘这就对了,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是谁译的?是傅雷。傅雷是什么人啊?’傅雷是学贯

中西的译家,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实。汪曾祺是极重用字的,如今这一派天真纯朴,实已经是经历了二次否定的皈依。其间的奥妙,是大有文章可做的。”铁凝、王安忆对汪曾祺的理解,是从一个晚辈的视角看到前辈的精华,同时更多地也是看到了一个小说家的情怀。

徐强先生的《汪曾祺年谱》让我作序。我犹豫再三,不知如何下笔。前面说了那么多,无非是表明徐强的这个年谱有价值。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当代作家都有年谱,但价值如何呢?不好说。汪曾祺的年谱,价值是多方面的,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,因为汪曾祺先生一生跨越了两个文学时代,他的写作发源于1940年代,这是现代文学重新认识发现现代性的时候,而汪曾祺的创作高峰是在进入1980年代后,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回到新文学的起点上。他跨越这样的时代,连接着巴金、老舍、赵树理、曹禺这样一些现代文学大师,同时又是现代作家进入新时期文学创作并成绩卓著第一人。很多现代作家进入到当代之后依然写作,但基本上属于续貂型的,甚至影响颠覆了他们早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。而汪曾祺在当代几十年的写作,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写作,不仅超过了他自己早年的作品,也超过同时代人的作品,这种“逆生长”的原因何在?我们在《年谱》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。至少《年谱》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,对于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补缺,而对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更是一个提醒。

汪曾祺有句名言,“流动的水,是语言最好的形象。”在阅读这本年谱时,我意外地想起汪老这句话。也许我是觉得,年谱又何尝不像语言一样,也是一种流水缓缓逝去的形象呢。一年一年过去,一生就像流水,而时间,是让静水流动起来的落差。作家的平凡肉身,如世间所有生命,根本无法摆脱或缓解时间巨大的推力。好在有文学,文学说到底,不过是一门对抗时间的艺术。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抵抗时间的落差,经久传世。这是人类的幸运。文学与时间,始终紧密相关。一位作家如何走过他的一生,也定然是后来的读者研究者在阅读与品鉴其作品时,无法忽略的问题。当然,还有空间——空间与时间构成一个人在世间活动的经纬刻度。汪曾祺的一生辗转多地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历经江阴、昆明、上海、江西、北京、张家口多地。这些迁徙之地,也以各种方式印迹在他的作品里,是我们无法忽略的。而年谱,简单些说,或许是勾画出一段时间、空间的经纬度,这种刻度与作品一起,让作家的形象与研究三维起来,立体起来。

年谱的编撰和研究,是一件非常枯燥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,尤其像汪曾祺这样“不爱惜自己羽毛”的人,从来不记日记,也不留资料,率性自由,不刻意为自己留下什么痕迹。年谱的编撰就是一个近乎“无中生有”的探轶和解疑。徐强的认真和执着,让我钦佩。他经年累月地在报刊的缝隙和史料边缘处搜索,通过蛛丝马迹找当事人核证。采访汪曾祺的事迹,寻觅汪曾祺渐渐模糊、淹没的足迹,努力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汪曾祺,居然洋洋经营80万字之多,可赞可叹!我周围的朋友中,有一大帮“汪迷”和“汪粉”,他们对汪曾祺先生的热爱和寻觅,已经让我极为惊讶,而徐强的工作更为笨拙和愚憨,也是这种笨拙和愚憨让他的年谱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文献。当然,我也隐隐感到徐强在探轶和考寻的过程中,又时常产生某种愉悦和快意——发现的愉悦、解惑的快意。

现在出版的虽是简本,但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汪曾祺在人间弯弯曲曲的足迹。常有人讲,人生最好的事,是这世界上还有人记得你是如何度过一生的。这句“鸡汤体”的话,却也阴差阳错道出身为写作者的一生旨归,不为留名、不为逐利,只是留下一些篇章文字,以及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些美好回忆。雁渡寒潭,本就不是为在寒潭留影,但却是大雁飞翔的身姿与方向,为人间传递着季节更替的信息。

理,小刚好像若无其事,反而安慰妈妈:关公刮骨疗伤也不喊疼,我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!妈妈情不自禁地说:小刚,真值价!

小刚妈妈也是值价的人。她姊妹四个,家境贫寒,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,12年的学杂费都是她自己勤工俭学缴纳的。上小学时她利用课余时间拾字纸、捡破烂;上中学了,利用假期在家搞些来料加工,或出外打工,其收入除了缴纳学杂费外,还有多余的贴补家用。有的亲戚早就暗暗地想资助他们一家,她总是婉言相拒,有时还会对姊妹们说:一个人如果轻易地接受别人的怜悯同情,那会增加一个人的惰性。她在家是老大,姊妹、弟弟们都听她的话。在学校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,高中毕业后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大学,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工作。亲戚朋友们只要谈起她的奋斗历程,都会竖起大拇指:这个人真值价!

小刚的“值价”,坚强;小刚妈妈的“值价”,既坚强又有骨气,母子俩都是好样的!

江准方言中,“值价”还有坚强、有骨气、怕麻烦人的意思。

小刚十岁时同妈妈一齐去北京、天津旅游,他穿了一双尺码较大的旅游鞋,每天要走不少路。他走起路来“脱拉、脱拉”的,脚后跟的皮肤磨破了,不喊疼,仍坚持跑,紧跟上旅游团队不掉队。3天下来,妈妈看他的脚跟,红肉显显的,已经磨出了一个小窟窿,妈妈心疼极了,买来了酒精、药水棉花、纱布、百多邦药膏给他处

中西的译家,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实。汪曾祺是极重用字的,如今这一派天真纯朴,实已经是经历了二次否定的皈依。其间的奥妙,是大有文章可做的。”铁凝、王安忆对汪曾祺的理解,是从一个晚辈的视角看到前辈的精华,同时更多地也是看到了一个小说家的情怀。

徐强先生的《汪曾祺年谱》让我作序。我犹豫再三,不知如何下笔。前面说了那么多,无非是表明徐强的这个年谱有价值。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当代作家都有年谱,但价值如何呢?不好说。汪曾祺的年谱,价值是多方面的,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,因为汪曾祺先生一生跨越了两个文学时代,他的写作发源于1940年代,这是现代文学重新认识发现现代性的时候,而汪曾祺的创作高峰是在进入1980年代后,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回到新文学的起点上。他跨越这样的时代,连接着巴金、老舍、赵树理、曹禺这样一些现代文学大师,同时又是现代作家进入新时期文学创作并成绩卓著第一人。很多现代作家进入到当代之后依然写作,但基本上属于续貂型的,甚至影响颠覆了他们早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。而汪曾祺在当代几十年的写作,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写作,不仅超过了他自己早年的作品,也超过同时代人的作品,这种“逆生长”的原因何在?我们在《年谱》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。至少《年谱》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,对于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补缺,而对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更是一个提醒。

汪曾祺有句名言,“流动的水,是语言最好的形象。”在阅读这本年谱时,我意外地想起汪老这句话。也许我是觉得,年谱又何尝不像语言一样,也是一种流水缓缓逝去的形象呢。一年一年过去,一生就像流水,而时间,是让静水流动起来的落差。作家的平凡肉身,如世间所有生命,根本无法摆脱或缓解时间巨大的推力。好在有文学,文学说到底,不过是一门对抗时间的艺术。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抵抗时间的落差,经久传世。这是人类的幸运。文学与时间,始终紧密相关。一位作家如何走过他的一生,也定然是后来的读者研究者在阅读与品鉴其作品时,无法忽略的问题。当然,还有空间——空间与时间构成一个人在世间活动的经纬刻度。汪曾祺的一生辗转多地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历经江阴、昆明、上海、江西、北京、张家口多地。这些迁徙之地,也以各种方式印迹在他的作品里,是我们无法忽略的。而年谱,简单些说,或许是勾画出一段时间、空间的经纬度,这种刻度与作品一起,让作家的形象与研究三维起来,立体起来。

年谱的编撰和研究,是一件非常枯燥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,尤其像汪曾祺这样“不爱惜自己羽毛”的人,从来不记日记,也不留资料,率性自由,不刻意为自己留下什么痕迹。年谱的编撰就是一个近乎“无中生有”的探轶和解疑。徐强的认真和执着,让我钦佩。他经年累月地在报刊的缝隙和史料边缘处搜索,通过蛛丝马迹找当事人核证。采访汪曾祺的事迹,寻觅汪曾祺渐渐模糊、淹没的足迹,努力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汪曾祺,居然洋洋经营80万字之多,可赞可叹!我周围的朋友中,有一大帮“汪迷”和“汪粉”,他们对汪曾祺先生的热爱和寻觅,已经让我极为惊讶,而徐强的工作更为笨拙和愚憨,也是这种笨拙和愚憨让他的年谱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文献。当然,我也隐隐感到徐强在探轶和考寻的过程中,又时常产生某种愉悦和快意——发现的愉悦、解惑的快意。

现在出版的虽是简本,但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汪曾祺在人间弯弯曲曲的足迹。常有人讲,人生最好的事,是这世界上还有人记得你是如何度过一生的。这句“鸡汤体”的话,却也阴差阳错道出身为写作者的一生旨归,不为留名、不为逐利,只是留下一些篇章文字,以及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些美好回忆。雁渡寒潭,本就不是为在寒潭留影,但却是大雁飞翔的身姿与方向,为人间传递着季节更替的信息。

值价

□ 朱延庆

理,小刚好像若无其事,反而安慰妈妈:关公刮骨疗伤也不喊疼,我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!妈妈情不自禁地说:小刚,真值价!

小刚妈妈也是值价的人。她姊妹四个,家境贫寒,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,12年的学杂费都是她自己勤工俭学缴纳的。上小学时她利用课余时间拾字纸、捡破烂;上中学了,利用假期在家搞些来料加工,或出外打工,其收入除了缴纳学杂费外,还有多余的贴补家用。有的亲戚早就暗暗地想资助他们一家,她总是婉言相拒,有时还会对姊妹们说:一个人如果轻易地接受别人的怜悯同情,那会增加一个人的惰性。她在家是老大,姊妹、弟弟们都听她的话。在学校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,高中毕业后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大学,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工作。亲戚朋友们只要谈起她的奋斗历程,都会竖起大拇指:这个人真值价!

小刚的“值价”,坚强;小刚妈妈的“值价”,既坚强又有骨气,母子俩都是好样的!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

初时看王心刚、张瑜版的电影《知音》,年少尚幼,情节尽忘,而独记得小凤仙在船头抚琴而歌,声韵历久弥新,至今耳熟能详,上阙末句为“人生难得一知己,千古知音最难觅”,柔情似水,婉转幽咽;下阙末句却峰回路转:“将军拔剑南天起,我愿做长风绕战旗,”豪情万丈,慷慨激昂,既切合了电影的名字《知音》,又对琴艺作出了最好的诠释——既说琴,绕不开高山流水,躲不过伯牙子期。

器乐之乐,在于赏心,闻弦歌而知雅意,又以琴为最佳:“琴临秋水弹明月,酒就寒山酌白云”,尽显风雅之情;“宫人清夜暗瑶琴,不识明妃出塞心”,不胜萧瑟之意;“十亩苍烟放秋鹤,一帘凉月夜横琴”,又难掩苍凉之态,此谓“曲中有心声”。西汉司马相如一曲《凤求凰》:“凤兮凤兮归故乡,遨游四海兮求其凰。有艳淑女兮在此房,何缘交接为鸳鸯?”众人只觉琴声铮琮悦耳,唯有文君一人听出曲中深意,宁可放弃锦衣玉食,与相如当垆卖酒而去。

古人入则琴,出则剑,琴、剑相随,故有“剑胆琴心”之说,琴既非文人所必备,剑亦非武士所独有。对此最有说服力的乃岳飞的一首词《小重山》:“昨夜寒蛩不住鸣,惊回千里梦,已三更。起来绕阶独自行,人悄悄,帘外月胧明。白首为功名,旧山松竹老,阻归程。欲将心事付瑶琴,知音少,弦断有谁听!”短短几行字,将一代名将金戈铁马、沙场征战一生却壮志难酬的悲愤郁闷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。

去杭州,必去看秋水山庄,那是民国报业巨子——《申报》掌门人史量才为爱侣沈秋水所筑。当年一无所依的沈秋水赴沪投奔故友,邂逅史量才,惺惺相惜,以全部身家交给史量才,成为其发家之资本,开钱庄银行,置金铺米行,更以12万元之巨款购得上海历史悠久、影响最大的《申报》,一举执上海报业之牛耳,故有“说《申报》必说史量

跑步协会1月中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,进行理事会换届。经一段时间思考,在理事扩大会上,我提出下届不再担任会长的想法。

不担任会长,并非是对协会没有感情,或是会长当不下去,而正恰恰相反。

首先是年龄因素,再干一届,年已七旬,人要尊重自然规律,要服老,心态再年轻,也赶不上时代潮流,不能让个人的惰性拖累协会的脚步。而且目前是协会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,活动正常,冠名落实,有接任人选,“运马”大体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操作程序,特别是市政府支持越来越得力。协会进入良性发展,是新老过渡的最佳时机,反过来若是协会或“运马”有很大困难,还真要硬着头皮顶下去,不能撂担子。

“运马”成功办了四届,影响力越来越大。要办得更长久(百年“运马”是我们的理想),办成品牌赛事,办成高邮名片,有很长的路要走,要靠几代人一茬一茬接力做下去。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,不会成事,只会误事。做了几年会长,学到不少,积累不少,自己有一定优势。但应该承认,会长再做下去,智慧空间日益缩小,惯性思维时时作祟,创新灵感只会枯竭,反而让同伴产生依赖。卸任后,我可以通过适当方式继续贡献智慧,换来的是激发大家活力,集中众人智慧,孰利孰弊,立下分明。

几次跟人说“环湖赛”、“运马”是我们的孩子”。这个说法可能有点矫情,不过,我和许多户外人真是这样想,这样做的;像做父母的那样,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呕心沥血想把他们培育成人见人爱的好孩子。然而此时我换了思维:环湖赛和“运马”,不是哪个孩子的孩子,只能是骑友跑友的孩子,是高邮的孩子。我要作出一个样子,按协会章程

才,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”之闻。故事本就有几分荡气回肠,仿佛红拂女与李靖,可是这样的故事里,却总有避不开的少为人知的一面。少年才子,风流潇洒,又如何能够为一人所羁绊?为表歉意,他便在西子湖畔,筑此宅院,并手书“秋水山庄”四字。沈秋水擅七弦,每每静夜焚香抚琴,说不尽的相思,道不尽的愁绪,唯有付诸清冷的琴声。

古代器乐,多以丝竹为原材料,琴、瑟、箏等,便属“丝”类,笙、箫、笛等便属“竹”类,故古人称音乐为“丝竹之声”,较之低一级的鼓笛而歌、击缶助兴,丝竹之声算得上是阳春白雪。有关琴的故事和传说,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,不胜枚举,故此,琴为古人修身养性必经之道。“泠泠七弦上,静听松风寒。古调虽自爱,今人多不弹”。不弹的原因,曲高和寡,世事变迁,今人很难再有那种“动听雨打残荷、静观云卷云舒”的闲情和逸致罢了。

旧时作画,琴者或于松下,或于林中,或于月夜,或于雨中,四时之景不同,而情趣各异。古人有“携琴合向古梅弹”之语。《清莲舫琴雅》录:王子良得一琴,质色甚古,每一鼓则清风忽发,庭中梅花飞动。子良叹曰:“此花不独解语,更能知音!”弹琴宜雅,宜静,最好是山中,梅林环绕,或折枝于瓶中,暗香盈袖,此时抚琴一曲,天人合一。

看一九八八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《山水情》水墨动画片,水墨画面素雅清丽,古琴配乐如天籁之音,全片融入道家师法自然、与世无争的思想和禅宗明心见性的灵感,美到极致。此刻只想一卷书,一弦琴,一壶茶,共三五知己,巡古道,采幽香,赏清韵,弄词章,看苔痕上阶,花落回廊,不需刻意,不需掩饰,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宁静和喜悦,无人能够知晓。

红尘世事多纷扰,唯愿与你共守那一份岁月静好。

卸任跑步协会会长

□ 尤泽勇

办事,不能因为有感情、有贡献,就霸在自己手上。

跑步协会从筹建到壮大,赛事从环城跑到四届“运马”,平心而论,我确实做了不少事,多方联系,带晚开会,绞尽脑汁,担惊受怕……有人觉得傻,有人羡慕我充实,怎么看?一方面确实不图任何功利,没有任何报酬,不私用一分钱,不吃一顿饭;反而处处受到约束;赛事摄影文章大赛,所有当评委的理事自己作品不参评,年终不参选最佳跑友和志愿者;另一方面,协会四年让我得到了不可估价的收益:收获了健康,收获了友情,收获了一段难忘而有趣的经历,形成良好习惯、年轻心态和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……这还不够吗?哦,还有,高邮跑步健身的人越来越多,看着他们兴奋的神态,听到他们夸赞我带动了大家跑步,心里美滋滋的,这是物质和金钱可比拟的吗?

别看我说得一套一套,心中也不是没有一丝波澜。纠结时想想跑马拉松的有句话:“完赛需要拼搏,放弃需要勇气”,套用一下:“担任需要担当,退出需要理智”。

伙伴们,你们能理解和支持我吗?感谢协会,感谢跑友,感谢马拉松运动!

孟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